



# “不要把我同人民群众隔开来”

## ——周恩来基层调研的五项规矩

今年3月5日，是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正值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际，刊发此文，意在向老一辈革命家学习调查研究，也以此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

——编者

□ 林 宁

三年困难时期的1961年5月3日至6日，周恩来总理来到河北省武安县伯延公社主要就农村公共食堂问题进行蹲点调研。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天，从细节中解读周恩来恪守的基层调研规矩，值得今天的领导干部好好学习和发扬。

### “突然袭击”的规矩

由于当时生活困难，伯延公社社员食堂以吃玉米糊糊和代食品（把玉米轴、玉米秆、棉花壳、红薯秧、榆树皮等磨成粉，掺入少量的红薯面、玉米面、糠面等煮熟后的充饥食品）度日。早就得知总理第一天中午要吃社员食堂饭的消息，社队领导精心安排一个社员食堂，一面让社员们提早把饭打走了，让总理看不到社员吃饭的真实情况，另一面想办法专门给总理做了面条、馒头、稀饭和红薯。这些情况哪能骗得过周恩来呢？

第二天中午，周恩来突然提出，还要到社员食堂去吃饭，而且要去另一家昨天没有去过的食堂。社队领导一下都慌了。原以为总理昨天去社员食堂吃过一次饭后就不会再去了，因此没有提前做好任何准备。周恩来来到一个食堂，只有炊事员和司务长还在，其他社员们已吃完饭回家了。跟随的公社领导对周恩来说：“总理，食堂没有饭了，还是回公社吃吧。”周恩来不说话，径直奔向灶台揭开锅盖，

锅内还剩些玉米糊糊。他问道：“这不是还有吗？”有人回答说：“这是炊事员吃的。”“那好嘛，我与炊事员一块儿吃。”周恩来叫炊事员盛一碗玉米糊糊，还掰了一小块代食品。过后派人送来1两粮票、5分钱饭费。

这次突击，周恩来吃上了真正的社员食堂饭，了解到了农村公共食堂的真实情况。在尊重基层调研安排的同时，周恩来常常采用“突然袭击”的办法，到那些事先没有得到通知安排、没有做过手脚的地方去调查，从中发现问题。他说：“你想摸到真实情况，就不要老是围着别人挑好的地方转，要多到那些事先没有得到通知的地方走一走，在那里你才会看到、听到最为真实的情况。”

### 躬身求教的规矩

周恩来来到了一片杏树园，有二亩多地，栽种着六七十棵杏树。在空隙地里，胡银福两口子正在栽红薯秧。他边看边问他们红薯怎么栽法，并顺势蹲下来，要帮着胡银福夫妇栽红薯。老胡的妻子李善琴赶紧拦住说：“可别，可别，都是泥。”她给总理讲，栽红薯要往坑里倒上水，将红薯秧弯着按下去，不能直着插进去。还说刚开始没有经验，直着插，结果红薯结得很少。周恩来听后连声说：“对，对，就是得学经验。”

周恩来说过，“领导地位并不能使你得到知识和经验，所以面向群众，汲取群众经验，十分必要”，“到人民中去生活，才能取得经验，学习到本事”。他一生坚持虚心向群众学习，认为：“在农村中，许多农民比我们勤劳勇敢，比我们有办法；在工厂中的广大工人，比我们能生产，比我们能创造；广大的劳动知识分子、学生，有的在许多方面比我们强。”在基层调研中他随时随地留心观察群众，一有机会就躬身向群众求教。

### 反复核实的规矩

在伯延，周恩来每访社员家，总要到社员存粮的房间走一走，到灶间

揭开锅盖看一看。一天中午，工作人员领着周总理来到徐翠叶家中。徐翠叶的婆婆刚从自留地栽红薯回来，正蹲在院内一个墙角烧灶火，准备热点榆叶汤喝。周恩来走到灶旁揭开锅盖看了看，没说什么盖上了，问徐翠叶的婆婆：“大娘，锅里煮的什么？”她说：“煮的榆叶汤，糊着把糠面。”听她这么一说，他又一次揭开锅盖细看了一下，嘴里不停地“啧啧、啧啧”。

周恩来在徐翠叶家第二次揭开锅盖是为了再核实一下第一次揭开锅盖看到的和听徐翠叶婆婆讲的情况。下基层调研就要掌握真实情况，周恩来在调研中很重视基层一线点上和面上情况的反复核实，绝不能搞“大概”“可能”“想当然”。他指出：“只有情况明，才能决心大，才能把工作搞好。还要谦虚谨慎，把情况弄明后再下决心，不能瞎搞。”后来他在1961年6月12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伯延调研情况沉痛地描述说：“除了树叶、咸菜、野菜以外，就没有东西了，硬是没有存粮。”一个“硬”字，就是周恩来在调研中反复核实后下的精准的结论。

### 和群众交朋友的规矩

在参加座谈会之前，伯延社队干部特意向社员张二廷再三交代：“总理可是大官，千万不能乱说。”在座谈会上，阅人无数的周恩来发现了这位真诚的农民，在他的引导下，张二廷第一个大胆说出了“食堂不好，食堂吃不饱”的真心话，说出了“总理，再这样糊弄下去，过两年连您也不会吃的”辣味十足的话。周恩来边听边鼓励，耐心听完张二廷一通话，激动地站起来，握住他的手说：“二廷，我周恩来走南闯北，很少有人说住我，今天你算是说住我了。好，二廷，咱们交个朋友吧！”

周恩来下基层调研时喜欢深入到群众中，乐于和群众交朋友。为何张二廷这样一个普通农民会被周恩来当作交友对象，而不是其他人。周恩来曾说过：“每个共产党员都得有几个党外朋友来往，可以多交新朋友，也可

以有些固定的朋友，能够反映一些意见，敢于提出意见的。”难得是净友，张二廷符合周恩来交友的标准。座谈会上他这样评价张二廷：“你是我下来遇到的第一个敢说真话的人。你们批评得很对，我很难过。”“张二廷说的是真理，只有他把我们看作自己人时，才会说这样的话，这是一针见血的话。”对这位新交的农民朋友，周恩来信守关心朋友、不忘朋友的信条，亲自到张二廷家看望，想办法帮助他抚养孩子，从这以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国务院或总理办公室每年都有人受总理委托到伯延看望张二廷。

### 不把群众隔开来的规矩

最后一次座谈会是5月6日下午在供销社院内的大屋进行，开完这个座谈会周恩来在伯延的调研就结束了。会议结束从屋里一出来，周恩来看到供销社大院内和门前的元宝坑广场上，密密麻麻的全是人。原来是附近十里八乡的乡亲们听到总理要走的消息，纷纷赶来送总理，约有上千人。总理的车停在村北，但是向北的路已经被沸腾的乡亲们堵住了，大家簇拥着总理，都想和总理握个手，警卫们拦也拦不住。周恩来一看这种场景，不让警卫拨开向北的人群，而跟簇拥的乡亲们向南走，慢慢绕着元宝坑广场走了一个大圈儿，并频频向乡亲们招手致意。

“不要把我同人民群众隔开来”“不要使我同群众有距离”，这是周恩来下基层调研对地方领导常嘱咐的一句话。他对不让群众见领导，或者让群众为领导让路，很反感，曾气愤地说：“例如我们领导同志走到哪里，就把众人拦住，为我们让路，你要平等待人，就不行，有些人一定把你搞得很特殊。我也不反对必要的警惕性，本来是坐在一起的，为什么要隔开来？我看这就是一种习惯势力，是封建的，有时不自觉就出来了。”

□ 党史人物

# 延安时期 党员干部的身份形象

□ 张俊国

延安时期是我们党的事业飞速发展的13年，也是我们党极大凝聚党心民心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党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效，无疑与党员干部的身份地位和特殊形象是密不可分的。

### 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

延安时期，党员干部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目中，既是一群“特殊”之人，也是一群普通之人。所谓“特殊”之人，是指党员干部在“理想信念”“艰苦奉献”“清正廉洁”等方面有着诸多与众不同的“特殊”之处。但同时，他们又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由于他们深受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熏陶与锤炼，再加上受到党的宗旨意识的鞭策与约束，所以，他们几乎没有谋求什么特殊私利的权力，有的只是在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之内和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密切联系群众而论，他们不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而是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兵。他们就好比一颗种子，人民就好比土地。只要他们到了一个地方，就会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以勤政廉洁而论，他们遵纪守法，不徇私情，不以权谋私，不贪赃枉法，不自私自利，不腐化，不贪污，不受贿，不堕落等。正是由于党员干部的这些明确的身份定位，所以，他们的思想及实践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高度认同与衷心拥护，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广大人民群众便心甘情愿地“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

### 廉洁奉公、勤俭节约

### 艰苦奋斗、与民劳作

官员特殊化在一定程度上说是阶级社会的普遍现象。但在延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个革命根据地虽说这种现象并没有完全绝迹，不过已经有了很大程度上的改观。对此，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于1939年1月在边区第一届参政会上十分自豪地告诉各位参议员：在抗战财政困难的条件之下，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工作人员一律实行不发薪俸的制度，尽管如此，这些工作人员却在工作之中能够把自己是群众模范的优秀一面充分地表现了出来。与此同时，他还进一步地告诉大家：“凭我们过去一贯的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能够自我牺牲，在少拿钱多做事，甚至不拿钱也做事的原则之下，为抗日的事业及人民的利益而奋斗。”1941年4月的政府工作报告同样非常自豪地告诉大家，在陕甘宁边区的各级政务人员已经“平民化”，他们不仅与老百姓食宿在一起，而且劳作在一起。尤其是在边区经济已经改善的情况之下，政府工作人员的日常用品仍然是草鞋、背包、粗粮薄被，伙食仍然是每天一斤四两小米，七分洋钱柴菜。尽管按照规定每人每月可以领取一元或二三元津贴，但却常常几个月不能按发。所有的政务人员同普通老百姓一样参加生产劳动，他们种粮、种菜、打柴、养鸡、养羊、织毛衣，以此“来减轻公家负担”。

由于党员干部不搞特殊化，许多党员干部还“有着群众的生活习惯”，所以，老百姓就愿意同他们接近，愿意把心中的话儿同他们讲，这样，党员干部就在与老百姓亲密无间的交谈交流之中了解到了民情，了解到了老百姓的冷暖。由此，制定的方针政策就能够反映出民意。反过来，由于党员干部皆有代表党的形象的自觉和自愿，所以，广大人民群众也就对党充满了无限的信任。他们“相信他们的金钱一定可以忠实地用于目的”。他们“不必担忧这会受贪官污吏的中饱私囊，或作买卖外汇的投机，或购买婢妾”。他们知道在党的领导范围之内，“没有从事火买卖舞弊的百万富翁，也没有剥削难民和伤兵劳动力的豪绅。”谁要是榨取忠实人民血汗的金钱，就会“像叛国者一样丧失他们的脑袋”。正因为如此，在延安时期的

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组织，其先进性必然要通过党员干部的言行体现出来。党员干部的言行不仅能够折射出党的价值取向，而且也能够让人民群众看出来党是不是为了他们的利益服务的，是不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早在1944年12月毛泽东就讲过这样的一句话，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党政军各个机构工作的一切干部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无论他们从事什么样的工作，无论他们从事的工作属于什么样的层面，无论他们所从事工作的繁简程度到底有多大，但他们都有一样共同的革命任务，即必须是“为人民服务”的。既然如此，党员干部的勤俭节约精神与作风就显得特别重要。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在颁布的《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中提出所有政府机关和政务人员都要厉行节约原则——不急之务不举，不急之钱不用。要提倡勤俭朴素，避免铺张浪费。要疏散机关，调整窑洞，停止建筑。要减少公差公马，提倡动手动脚。要实行粮票制，免去双重粮的浪费。要注意一张纸、一片布、一点灯油、一根火柴的节省。坚持廉洁节约作风，严厉反对贪污腐化现象。

为了将这项规定落到实处，不少单位或者部门分别提出了具体化的举措。如晋察冀军区不仅把反贪污、反浪费的斗争看作是抗日战争时期的重要任务之一，而且还把有关经费的开支作出明细化的规定。在招待费方面，本军干部互相来往，营长到团部，营长与营长的相互来往，开一个一般的教育准备会就可以了，不必专门招待。如果招待了，就是浪费。“以后这样的花费，一个钱也不报销。有钱自己去请客，公家不允许这样的‘招待’”。在过节费方面，未经任何批准，不允许擅自用钱，“供给机关对这样的款子不报销”，而且“也无权报销”。今后如果出现“擅自去用”的现象，“公家不报销，由他自己津贴费中一点一点地去扣，并且要受适当的处分”。他们不仅自备自己的衣食住行等的费用，而且还要尽量节约其生活费以便将其捐助给抗战的团体或者群众的团体。党正是通过这些措施，不仅保证了各县乡政府的廉洁，而且也保证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

□ 以史为鉴

# 管党治党理念方式的重大创新

□ 朱诗柱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用“全面从严治党成效显著”来评价过去五年党的建设成就。之所以能取得卓著成效，一个重要原因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将纪律建设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提出和落实了“把纪律挺在前面”的重大举措，从而实现了管党治党理念与方式的重大创新，丰富和发展了党的建设理论。

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找准了以党性要求为基准的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纪严于法、纪在法前，这是由我们党的先锋队性质、先进性要求、执政党地位和崇高历史使命决定的。作为中国公民中的“先进分子”“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共产党员理所当然应该比普通公民更为严格地要求自己；其行为底线，也就是党员最基本的党性标准、党性规范，理所当然应该严于普通公民所必须遵守的法律规范。

全面从严治党，关键在“严”，要害在“治”，而严的标准就是党纪，治的途径就是严明纪律。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在法律底线之前设下一道纪律防线，使之成为管党治党的尺子、不可逾越的红线、拒腐防变的“堤坝”；用纪律管住全体党员，管住“小节”小错，把“病毒”“虫害”消灭在萌芽状态，维护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这实际上就是治本，就是基于党性要求的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由此，“挺纪在前”就大大压缩了不正之风与腐败现象的生存空间和滋生土壤，就为管党治党走向标本兼治找准了现实路径，实现了管党治党理念与方式的深刻变革。

坚持明纪在先、扎紧制度笼子，贯彻了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的治党规律。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光靠觉悟不够，还要靠严明的纪律和规矩，要“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统一”。这一重要论断，指明了管党治党的基本抓手，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一条重要规律。

坚持依纪治党、制度治党，“有纪可依是前提”“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首先要建好笼子”“破除潜规则，根本之策是强化明规则”。据此，党中央坚持问题导向、破立结合，于法周延、于事有效的理念，“下大力气建制度、立规矩”，深入推进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不断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突出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全方位扎紧制度笼子。党中央坚持明纪在先，一方面，对党员干部哪些事能做、哪些事不能做、能做的事该如何做，都规定得明明白白，清晰地拉起了高压线、划出了警戒线，使纪律规矩“禁于未然之前”，不搞“不教而诛”。另一方面，在制度制定过程中广泛发扬民主、听取意见建议，增强党员干部对制度的认同；大力开展党规党纪宣传教育，督促广大党员干部以各种形式学思践悟、入脑入心，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这就鲜明地贯彻了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的治党规律。

坚持严格执纪、动辄则咎，回归了作为先锋队组织的共产党“最讲认真”的本真境界。毛泽东同志曾指出：“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对我们党来说，认真是优良传统，更是政治本色。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深刻总

结一段时期以来管党治党、执行纪律失之于宽、失之于松、失之于软，导致党的观念淡漠、组织涣散、纪律松弛等问题的教训；深刻认识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纪律执行不到位，就有可能使党规党纪成为“稻草人”“橡皮泥”而形成“破窗效应”，导致损害纪律规矩公信力的危害性；以一分部署、九分落实，言出纪随、执纪如山，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韧劲，狠抓纪律执行、制度落实。对各种违纪违规行为，以零容忍的态度，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动辄则咎、决不姑息，决不搞“法不责众”“下不为例”，决不留“暗门”、开“天窗”，决不搞法外施恩、养痍遗患，形成强大势场，使纪律规矩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而“禁于已然之后”，充分发挥了全面从严执纪的预防功能、规范功能和惩戒功能。

坚持明责履责、监督问责，开创了“管全党、全党管，治全党、全党治”的良好局面。“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从严治党、从严执纪必须发挥问责追责的利器作用。为此，一是狠抓明确责任，以明责引导履责。牢牢抓住党建工作责任制这个“牛鼻子”，开列责任清单，明确各级党委（党组）、纪委（纪检组）的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形成具体明确、环环相扣的“责任链”。二是狠抓强化监督，以监督推动履责。修订巡视工作条例，着力发现违纪问题，发挥好“利剑”作用；修订出台党内监督条例，抓住“关键少数”，破解监督难题，确保党章党规党纪得到有效执行；探索运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强化日常教育管理监督，实现“挺纪在前”的具体化，抓早抓小、防微杜渐，既

治标、又治本。三是强化问责追责，以问责倒逼履责。制定出台问责条例，对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管党治党不力、纪律规矩执行不到位的，铁面问责，而且坚持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直接责任和领导责任、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责任一起追究，坚决维护纪律规矩的严肃性和权威性。这就倒逼各级党组织层层传导压力、层层压实责任，真正做到了“管全党、全党管，治全党、全党治”，形成全党一起抓的良性局面。

坚持纪在法前、纪法分开，兑现了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庄严承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将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运用到党的建设中，把“挺纪在前”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抓好严明纪律这个关键，严格依规依纪治党，从而推动管党治党从宽松软走向了严标本，增强了从严治党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实效性，“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推动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迈上了新台阶。经过几年来的努力，党员干部的作风持续向好，政治生态明显改善，带动社会风气明显好转，赢得了党内外、国内外的高度赞誉。这就以“行胜于言”的担当和成效，兑现了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庄严承诺，从而进一步增强了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和支持，进一步厚植了党执政的政治基础和群众基础，为开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局面、夺取新的伟大斗争的胜利提供了重要保障。

□ 党建视角